

# 采風南洋：邱菽園竹枝詞探略

林 立

新加坡國立大學

## 摘要

殖民地時期，新加坡舊體詩人喜以竹枝詞描寫本地風俗、文化及離散經驗。這種源自民歌的詩歌體裁，一向被傳統文人用來書寫邊遠地區的風土與艷情。本文以「南國詩宗」邱菽園的竹枝詞為研究對象。邱氏是戰前新加坡舊體詩壇的領袖，總共寫了一百多首竹枝詞，發表於他主編的報章副刊。文章首先回顧竹枝詞的寫作傾向與文體特征，續以邱菽園的竹枝作品為例，探討竹枝詞與出版文化的關係、邱氏對本地社會風俗的看法，和他怎樣在作品中運用本土語言、聯章與註腳等寫作手法。

**關鍵詞：**邱菽園、竹枝詞、南洋、新加坡

## 一、前言

華夏文明——剩竹枝，南洋風物被聲詩。蠻花駝鳥多佳處，恨少通才作總持。

康有為〈題菽園孝廉選詩圖七絕五首之一〉<sup>1</sup>

1898年「百日維新」運動失敗後，晚清思想家、政治家康有為（1858-1927）於1900年流亡新加坡。他受到了新加坡華商領袖、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文人邱菽園（1874-1941，名煒菱，菽園是他更常使用的號）的熱情接待與大力支持。他們承繼了傳統文人交往的習慣，常常互贈詩作。然而，康有為在前文所引絕句表露出兩種遺憾：一是華夏文明在南洋唯有竹枝詞碩果僅存；二則是南洋風物儘管取之不盡，但曹丕（187-226）〈論文〉中的「通才」且能為詩的人卻不多見。在康有為看來，邱菽園自然是能擔此重任的合適人選，邱氏也的確未令他失望。邱菽園傳奇的一生創作過相當多的竹枝詞，這些作品都以描繪並品評本地社會與風俗為主題。

將竹枝詞視作華夏文明在新加坡的獨苗，未免誇大其辭，但這種詩歌體裁的確在當時隨著儒商階層的興起與近代報刊的出現而蓬勃發展。有賴於左秉隆（1850-1924）與黃遵憲（1848-1905）這兩位清廷駐新加坡總領事的推動，新加坡的華人開始變得「稍有文風」。<sup>2</sup> 隨後，發表在本地華文報章上的舊體詩數量明顯增加。據李慶年所編《南洋竹枝詞匯編》，從1888至1950年，發表在新、馬兩地的竹枝詞至少有四千一百九十七首，儘管其中一些作品不應算作竹枝詞。<sup>3</sup> 此書材料豐富，以出版年份為序，並提供資料出處與注釋，不僅通過大量生動的詩歌作品向我們呈現了二十世紀初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及本地風貌，同時也對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的研究大有裨益。它收錄了幾百位詩人的作品：其中一些較為著名，如邱菽園和丘逢甲（1864-1912），另外一些在本地小有名氣，而大多數作者都沒沒無聞，只知道他們大概是中國移民。不過，廣泛而模糊的作者背景恰恰能夠說明，竹枝詞特別受到一般詩人的喜愛，他們將其視為一種便捷的文學表達方式。儘管增加了一些新元素，這些作品仍然遵循竹枝詞的創作傳統：形式上與七言絕句完全一致；內容上也符合傳統竹枝詞的特點——帶有典型的、強烈的世俗風味，語言通俗或使用方言語彙，也有不少描寫艷情與風俗之作。<sup>4</sup>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作這樣的比喻：詩人選擇用竹枝詞這種詩歌體裁來記載他們的離散經驗時，對其形式的繼承與保留，就像華人移民保存了華夏的文化遺產一樣，而內容的變化則代表他們能很好地適應當地的生活。

竹枝詞的研究也印證了有關海外華人移民經驗的重要觀點：大多數華僑仍然心繫故國，在傷感於遠離祖國的同時，試圖去適應本土的生活。<sup>5</sup> 但它同時也修正了文學研究中的一些謬誤。首先，對南洋生活的書寫並不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僅限於白話文學，也包括舊體詩的創作，特別是竹枝詞。而一些現代的觀念與主題，如對新科技的接受、對不平等待遇的抨擊、婦女解放及重視現代教育等，這些肯雷（David Kenley）在研究新加坡白話文學時發現的主題，也常常出現在舊體文學中。<sup>6</sup> 他在談論「五四運動」對新加坡的影響時，肯定了文學發展的延續性，

\* 本文原以英文撰寫。在此感謝本人博士研究生張玉女士在翻譯過程中的協助。

<sup>1</sup> 康有為：〈題菽園孝廉選詩圖七絕五首之一〉，收錄於康有為：《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17。

<sup>2</sup> 李鐘珏（1853-1927）：《新加坡風土記》（新加坡：南洋編譯所，1947年，重印1895年版），頁10後。關於左秉隆對新加坡的貢獻之研究，詳參陳育崧（1900-1984）：〈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收錄於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年），序言，頁1-9。關於黃遵憲的文教成就，見葉鐘玲：〈黃遵憲與圖南社〉，收錄於《亞洲文化》，1991年第15期，頁121-140。

<sup>3</sup> 李慶年：〈南洋竹枝詞概說〉，收錄於《南洋竹枝詞匯編：中國以外唯一竹枝詞匯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年），頁7。

<sup>4</sup> 趙穎在其專著中曾簡要地提及新加坡竹枝詞的文學特點與社會功能，詳參氏著：《新加坡華文舊體詩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頁178-185。然而，除了需要更多的文本細讀之外，竹枝詞創作背後的文化特徵、作者心態，以及新加坡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與出版文化等方面，都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sup>5</sup> 見Kenley, David,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65, 182.

<sup>6</sup> 關於這些白話文學中的現代概念與主題的研究，見Kenley, David, *New Culture in a New Worl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ingapore, 1919-1932*, pp. 115-132.

認為「白話文的使用……並不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普遍」，直到 1922 年，在新加坡第一份華文報章《叻報》上刊載的舊體文學作品仍然多於白話文。<sup>7</sup> 梁啟超 (1873-1929) 及一些新加坡「進步」報人所寫的舊體文說明，新的西方思想並非僅通過白話文首次被華人社會引入並提倡。白話文對啟蒙運動的先驅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被文學理論家和歷史學家誇大了。

本文第一部分將回顧竹枝詞的寫作傳統，試圖重新界定它的文體特徵。接著以邱菽園的作品為例，進一步分析竹枝詞與本地出版文化的關係，以及邱氏如何以此詩歌體裁展現豐富的南洋特色和進行道德教育，並將當地語言、組詩及腳注等寫作手法融入其創作之中。

## 二、竹枝詞的寫作傳統與文體特徵

自唐代的劉禹錫 (772-842) 開始，竹枝詞逐漸成為一種具備「采風」或「觀風」功能的詩歌體裁，除了書寫各地風土民情，還承載一定的道德教化意味。學者普遍認為元代詩人楊維禎 (1296-1370) 的〈西湖竹枝詞〉，是竹枝詞文體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鞏固了這一體裁記詠風土的寫作功能。<sup>8</sup> 楊氏接受了傳統采風詩學的觀點，認為竹枝詞的創作背後具有道德意義的考量，所謂「發情止義，有風人騷子之遺意」。<sup>9</sup> 明清兩代，湧現了數以萬計的竹枝詞，詩題多加上特定的地名或主題來凸顯作品的獨特性。一些竹枝詞甚至以海外風光為題，例如尤侗 (1618-1704) 的一百首〈外國竹枝詞〉，以及潘飛聲 (1858-1934) 的〈柏林竹枝詞〉。<sup>10</sup>

就新加坡竹枝詞來說，詩題中也常帶有南洋地名，如許多作者的〈星洲竹枝詞〉，以及最早的一組有關新加坡本地的作品——蕭雅堂的〈新嘉坡竹枝詞〉。<sup>11</sup> 其中一些詩題提及當地的遊樂勝地，如潘生楠〈遊小坡新世界竹枝詞〉；<sup>12</sup> 或提及某節日，如何漁古〈本坡新年竹枝詞〉。<sup>13</sup> 還有些詩題與政治時事相關，例如一些作者所作的〈時事竹枝詞〉。另有些竹枝詞描寫了當地特殊的社會現狀，如謝豹的一組〈女子游泳新竹枝〉，和曉了的一組〈時髦女竹枝詞〉。<sup>14</sup> 這兩組詩描寫了華人女子的新式生活與裝扮，而這些常常引來男性作者好奇的眼光。<sup>15</sup>

可想而知，隨著竹枝詞的普及，這種文學體裁的主題和風格都被擴大與多樣化了，難免引起在文體形式與特點方面的爭議。翁聖峰在其《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一書中，借用了哲學邏輯上的「唯名定義」與「實在定義」兩個概念來界定竹枝詞：前者是指以字面上是否稱「竹枝詞」作為判斷依據；後者則是指各方面讀起來非常像竹枝詞但標題並非「竹枝詞」的作品。<sup>16</sup> 總體來說，只要是描寫地方風俗的，或者有一個特定的主題——如雜體詩與紀事詩，或雜事詩——都可以用「竹枝詞」或「竹枝體」稱之。<sup>17</sup>

<sup>7</sup> Kenley, "Singapore's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Overseas Print Capitalism,"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70 (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 pp. 11-12.

<sup>8</sup> 莫秀英：〈從唐代到清代文人竹枝詞題材內容的發展演變〉，《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2 年第 2 期，頁 122-125；蕭啟慶：《九洲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2012 年），頁 235-238。

<sup>9</sup> 楊維禎：〈西湖竹枝詞序〉，收錄於宋緒編：《元詩體要》，四庫全書版，第 1372 冊，卷四，頁 544 下。

<sup>10</sup> 莫秀英：〈從唐代到清代文人竹枝詞題材內容的發展演變〉，頁 126-127。

<sup>11</sup> 蕭雅堂所作兩組〈新嘉坡竹枝詞〉，分別刊載於 1893 年 11 月 14 日、及 1894 年 1 月 25 日的《叻報》，第 6 版及第 5-6 版，另見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9。

<sup>12</sup> 《南洋商報》，1929 年 7 月 23 日，第 22 版；另見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158-159。小坡，泛指新加坡河北地區，見王振春：《石叻老街》（新加坡：勝友書局，1997），頁 2-10。

<sup>13</sup> 《叻報》，1910 年 2 月 15 日，第 11 版；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23。

<sup>14</sup> 謝豹的竹枝詞發表在 1929 年 10 月 25 日的《星洲日報》，第 19 版；曉了的則發表在 1934 年 10 月 31 日的《新國民日報》，第 14 版。另見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162-163，頁 203。

<sup>15</sup> 同類的竹枝詞也出現在其他的現代都會，如香港、上海和三藩市（舊金山），體現了其他地方的男性華人對於西化的女性也有同樣的困惑。有關香港竹枝詞的例子，見程中山：《香港竹枝詞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14-15。有關北美的情況，見拙作："Gold Mountain Dreams: Classical-Style Poetry from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收錄於 Grace S. Fong ed., *Hsiang Lectures on Chinese Poetry*, Vol. 7, 2015, pp. 72, 79-80。關於上海的例子，詳參夏曉虹：《社會百象存真影：說近代竹枝詞》，收錄於《讀書》，1989 年第 10 期，頁 148-149。

<sup>16</sup> 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頁 5-6。

<sup>17</sup> 同前註，頁 30-39。

一些清代學者早已嘗試從形式、風格與內容方面來界定竹枝詞的文體特點。如劉大勤、謝金鑾（1757-1820）以下的兩段論述，都將竹枝詞與上層文人精緻的作品區別開來，強調竹枝詞的風趣與質樸：

竹枝詠風土，瑣細談諧皆可入，大抵以風趣為主，與絕句迥別。<sup>18</sup>

五、七言詩，以典雅麗則為宗。唯竹枝雜道風土，雖方言里諺皆可以入則，猶國風之遺也。<sup>19</sup>

如同儒家經典，竹枝詞被賦予了更高的教化目的與社會批判意義。袁學瀾（1804-1879）在《姑蘇竹枝詞》的後敘中，對竹枝詞的社會政治功能作出了更明確的闡釋：

竹枝之作，所以紀土風之奢儉，表民俗之邪正，以備采風者之取擇。<sup>20</sup>

袁學瀾一方面強調竹枝詞的社會功能，一方面與劉大勤、謝金鑾持相同的觀點，認為簡樸和「尚質」才是竹枝詞的文學特質，而非僅追求「靡麗」。

除了七言絕句，竹枝詞另一公認特點則是連章組詩的採用。詩人少有僅作單首竹枝詞的，因無法在四句詩中充分地描寫多樣的社會狀況。一組連章竹枝詞的數量從幾首到上百首不等。<sup>21</sup> 它們通常沒有一個明確的次序，看起來像是隨意書寫。一些連章竹枝詞會有序言，或是在作品的前面或後面有一首敘述作者創作動機的作品。不過整體來說，這些竹枝詞在內容方面的聯繫是十分鬆散的。<sup>22</sup>

自明代以來，一些竹枝詞的作者開始在詩中加上自注。這種做法到了清代更為盛行，因為許多竹枝詞是由清廷的使節或出國遊歷者寫成的，常常涉及一些大眾所不了解的異域風情或主題。竹枝詞本身簡明的詩句令讀者無法完全了解詩中的背景信息，因此有關特定的地名、物名以及社會現象的文字注釋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在詩和具有說明性質的注釋文字之間便有了功能上的劃分，前者屬於感性的評論或個人抒懷，後者則是資料的補充。不少竹枝詞作者也希望他們的作品能夠成為史料的一部分，被歷史文獻、特別是方志採用，因而主動為竹枝詞添加詳細的注釋。<sup>23</sup> 在新加坡殖民地這樣的異國他鄉，複雜的文化環境對移民詩人與讀者來說是如此的陌生，因此反映當地風土民情的竹枝詞尤其不能缺少注釋，邱菽園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證。

### 三、邱菽園的竹枝詞

邱菽園出生於福建海澄縣，1894 年他參加了科舉鄉試中式為舉人，是唯一獲此殊榮的新加坡華人。作為清末變法運動的支持者，他為康有為的保皇會慷慨解囊。清朝覆亡後，他轉而支持民國。儘管新加坡是邱菽園的寓居地，但他一生都對祖國念念不忘。他不僅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也是一位慷慨的慈善家，1907 年他因揮霍無度且經營不善而破產。之後他在當地華文報紙擔任主編謀生，同時擔任中華總商會和漳州會館的理事。1930 年後，由於患有麻風病，他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1941 年去世，終年六十八歲。他的一生留下了大概一千四百首詩作。<sup>24</sup>

<sup>18</sup> 劉大勤：《師友詩傳錄·續錄》（臺北：臺灣商務，1983 年-），四庫全書版，第 1483 冊，頁 900 上。

<sup>19</sup> 謝金鑾：〈臺灣竹枝詞序〉，收錄於陳漢光主編《臺灣詩錄》，引自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頁 141。

<sup>20</sup> 袁學瀾：〈姑蘇竹枝詞後〉，收錄於趙明等編著：《江蘇竹枝詞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561。

<sup>21</sup> 例如賴尚益（1887-1962）的作品集《閩紅墨屑》，共收錄其竹枝詞八百四十二首，儘管作品集並未以「竹枝」為名，翁聖峰仍將他的這些作品視為竹枝詞。詳參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頁 6、199。

<sup>22</sup> 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頁 159-164。

<sup>23</sup> 同前註，頁 47-49。

<sup>24</sup> 有關邱菽園生平，詳參楊承祖：〈邱菽園研究〉，《南洋大學學報》，1969 年第 3 期，頁 98-118；李元瑾：《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分子的三種回應：邱菽園、林文慶、宋旺相的比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出版社，2001 年），頁 33-43；邱新民：《邱菽園生平》（新加坡：

邱菽園被譽為「南國詩宗」，<sup>25</sup> 他的詩歌涵蓋了多種多樣的題材，如中國歷史、佛教信仰、南洋風物與生活的書寫、他個人生活的掠影以及他與風塵女子的來往。作為新加坡竹枝詞最多產的詩人之一，邱菽園發表了許多組竹枝詞，以及另外兩組可以視作類近竹枝詞的作品，共計一百四十四首。<sup>26</sup> 其中包括：〈十六夜即事竹枝詞〉（四首，作於 1909 年）、〈元月十六夕新嘉坡即事詩並序〉（五首，作於 1914 年）、〈歡樂園雜詠〉（六首，作於 1924 年），以及發表在許多期《星洲日報》上的〈星洲竹枝詞〉（自 1932 年至 1933 年共發表一百二十九首）。在數量上，只有曾夢筆（1903-1977）這位來自檳城的年輕記者可以與之比肩。<sup>27</sup> 本文接下來將討論邱菽園竹枝詞的社會與文學意義，同時也聯繫他作為報章主編的身份，探討竹枝詞與出版文化之間的關聯。

在殖民地時期，大多數人都負擔不起出版個人作品集的費用，報紙是一般作家出版的唯一渠道；也多虧了這種現代大眾媒介，數以萬計的竹枝詞被傳播並保存了下來。邱菽園最初也許並沒有推廣竹枝詞的打算，但他後來似乎意識到這種通俗文體在道德教化與書寫南洋生活方面的獨特功能。因此，他藉自己作為編輯的優勢，發表他的竹枝詞及其他一些較通俗的作品，如宣傳抗戰的組詩〈抗戰韻言〉。<sup>28</sup>

在破產之前，邱菽園於 1898 年創辦了《天南新報》，為康有為的變法運動吶喊助威。<sup>29</sup> 他採取了較為寬鬆的選錄方式，發表了大量他自己創作的、和投稿給他的舊體詩，其中也包括葉季允（1859-1921，《叻報》主編）和祝軒氏（生卒年不詳）的竹枝詞。<sup>30</sup> 不過此時他還並未發表過自己的竹枝詞。1910 至 1913 年，窘困的邱菽園出任了《總匯新報》文學專欄的編輯，並於 1909 年年初發表了他的第一組竹枝作品。

在新加坡的傳統文人就像他們在原鄉時一樣，並不是移民社會的一般成員或旁觀者，而仍然保持著道德教化者的角色。遵照儒家的文學觀念，他們認為詩歌是考察社會風俗的重要媒介，且有助於「移風易俗」。他們以屈原、劉禹錫及其他古代詩人為楷模，即使被放逐到偏遠、蠻荒的地方，也不曾忘記自己的文學「使命」。從某方面來說，他們是文明風俗的守護人，正如邱菽園下面一首竹枝詞所言：

豈憑鑽石炫多金，畢竟儂家別有心。欲寫我心非轉石，居然識字解調音。<sup>31</sup>

這組竹枝詞批判了一些女性在正月十六的晚上出遊時炫耀鑽石的奢侈行為。其詩序寫道：「坡俗婦女，咸於是夜出遊，名曰擲石，藉以表其潔白無瑕也。」而這個習俗現今已經被改變了：女人們當街佩戴鑽石，只是為了炫耀財富，因此邱菽園質疑她們的動機。詩的后兩句，邱氏引用典故讚揚了一個有學識、輕視物質且忠貞不渝的女性。與炫目的、可轉售的鑽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詩中女子的「我心非轉石」，取自《詩經·邶風·柏舟》中的「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勝友書局，1993 年）。

<sup>25</sup> 或稱「南僑詩宗」，見邱新氏：《邱菽園生平》，頁 17、148。

<sup>26</sup> 在李慶年的選集中，邱菽園還有另外兩組（一百八十二首）有關抗日戰爭的組詩，詩題為「抗戰韻言」（1938 至 1939 年發表於《星洲日報》）與「獻物推運」（1938 年發表於《星洲日報》），見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223-234。筆者並未將其計入竹枝詞，因為這些作品讀來更似宣傳作品，甚至是打油詩。

<sup>27</sup> 曾夢筆年輕時從福建移居檳城，於 1939 年來到新加坡擔任《總匯新報》的翻譯，之後便結識了邱菽園。見馬倫：〈曾夢筆小傳〉，[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e8c7eda0102v5zv.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e8c7eda0102v5zv.html)（瀏覽於 2017 年 8 月 4 日）。曾夢筆發表了許多組竹枝詞及其變體，大約有一百首。參閱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235-239。

<sup>28</sup> 邱菽園早期的筆記文集以討論詩歌創作為主，但只提到過一次竹枝詞，是有關丘逢甲的〈臺灣竹枝詞〉。見邱氏：《揮塵拾遺》（上海：觀天演齋叢書版，1901 年），卷四，頁 10 前-10 後。這些早年的文集，展現出精英階層的詩學觀點。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才逐漸改變了詩歌的創作方向，並創作了一些更易於被一般讀者接受的作品。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之一，便是抗戰的爆發，正如〈抗戰韻言〉所呈現的那樣。

<sup>29</sup> 關於《天南日報》的創辦歷史與政治立場，詳參崔貴強：《新加坡華文報刊與報人》，頁 9-12。

<sup>30</sup>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35-138、149。

<sup>31</sup> 邱菽園：〈十六夜即事竹枝詞〉，四首其三，載於《總匯新報》，1902 年 2 月 8 日，第三版；收錄於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21-22。

描寫了女子在被逼改嫁（據《毛詩正義·卷三》）時表現出的忠貞。有趣的是，「轉石」諧音「鑽石」，一語雙關，諷刺與讚賞的態度更加鮮明了。<sup>32</sup>

在邱菽園任職《總匯新報》期間，也選錄了其他詩人的一些竹枝詞組詩。三十年後同樣在《總匯新報》，他的晚輩曾夢筆又創作了二十五首令人印象深刻的〈星洲雜詠竹枝詞〉。

在邱菽園任《振南日報》（1913-1920）編輯時，他向當時著名的詩人及友人約稿。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維新運動主將陳寶琛（1848-1935），他曾於1916年發表了一組〈息力雜詩〉。<sup>33</sup> 1914年，邱菽園在該報發表了另一組有關「十六夜」的組詩。詩序云：「本島風俗，華僑內眷，是夕靚妝挈伴，往廟燒香，繞道回車，納涼玩月，輒循海濱一帶，不禁途人瞻矚……互耀釵鈿，意主跨賽，島婦見識，宜其然已。……」下面是五首組詩的第三首：

笑和諧謔透香風，暗闌釵環露指蔥。絕島嬉春展元夕，萬花開向月明中。<sup>34</sup>

此詩寫出了華人新年的熱鬧氛圍。然而就如之前一組一樣，邱菽園在詩的第二句批評了女性刻意炫耀珠寶的行為，並慨歎這種行為的根源是由於缺乏見識。難怪在他未破產前，曾在1899年幫助創辦新加坡女子學校，並捐贈三千元（相當於當時啟動資金總額的一半）以促進婦女教育。<sup>35</sup>

1924年邱菽園擔任《叻報》文藝副刊「叻報俱樂部」編輯時，發表了他的「竹枝體」組詩〈歡樂園雜詠〉。同年，他與詩僧釋瑞于（1867-1953）一同創辦了檀社，因此，這段時間內該報刊登的舊體詩大都出於檀社成員之手。<sup>36</sup> 〈歡樂園雜詠〉其實是檀社的一次集體創作，<sup>37</sup> 它描寫了由富商林德金（1882-1938）於1921年開辦（於1928年關閉）的新加坡的第一個遊藝場。<sup>38</sup> 這個遊藝場位於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不僅是一個娛樂場所，也因園內的賭博活動而臭名昭著。<sup>39</sup> 邱菽園在他的詩中提到了這一點：

縱博千場局易終，敗原非拙勝何功。投壺但識撩天笑，得失由他論楚弓。<sup>40</sup>

此詩沒有痛陳賭博的害處，而是從道家思想的角度論述了得與失的無常，指出賭博的輸贏無關技巧和賭術，只是運氣而已。顯然邱氏並不僅僅在談論賭博，他關注的反而是個人命運的沉浮。財富的來去無常他深有體會，因為他自己就經歷了這樣戲劇性的轉折，他在商界的賭博也是那樣輕易就結束了。詩的最後一句引用了劉向（前77-前6年）在《說苑》中提到的典故，楚王出獵時遺失了他的弓，但他阻止臣下去找尋，並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sup>41</sup> 楚王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說弓也並非真的遺失了。這個典故傳達出邱菽園對人生無常及財富的看法。他正如楚王一樣樂觀，認為他的財富並非消失於無形，只是暫時轉移到了他人的手中。

<sup>32</sup> 特此感謝江寶釵教授為我指出此處的諧音。

<sup>33</sup> Selat（中譯息力或石叻），馬來語，意為「海峽」，是新加坡舊時的譯名。陳寶琛的五首組詩，載於《振南日報》，1916年12月2日，第13版；另參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41。李慶年的選集中共收錄了陳寶琛七首作品，然而最後兩首實際上是易順鼎的作品，刊登於1916年12月4日的《振南日報》，題為〈香江旅次寄懷邱星公〉。

<sup>34</sup> 邱菽園：〈元月十六夕新嘉坡即事詩並序〉，刊載於《振南日報》，1914年2月18日，第5版；或見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30。

<sup>35</sup> 邱新氏：《邱菽園生平》，頁47-48。邱菽園在他的詩話集中也曾提到婦女教育的重要性。見氏著：《五百石洞天揮塵》（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1898年），觀天演齋校本，卷十一，頁15後-17前。

<sup>36</sup>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288。

<sup>37</sup> 包括邱菽園在內的五位詩人參與了這次集體創作。見邱菽園：《檀樹詩集》（新加坡：檀社，1926年），頁20後-23前。

<sup>38</sup> 見傅無悶等編輯：《南洋年鑑》，第二期「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商報出版社，1951年），頁223；吳華：《獅城掌故》（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1年），頁94。歡樂園關閉的報導刊登於〈歡樂園宣告停業〉，載於《南洋商報》，1928年5月1日，第3版。關於林德金生平，見柯木林主編：《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私營有限公司，1995年），頁137。

<sup>39</sup> 見〈是賭博之變相〉，載於《南洋商報》，1924年5月5日，第16版；〈歡樂園內之賭博檔〉，載於《南洋商報》，1925年8月20日，第3版。

<sup>40</sup> 邱菽園：〈歡樂園雜詠〉，六首之其三，刊載於《叻報》，1924年6月21日，第16版；或參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101。

<sup>41</sup> 劉向：《說苑》，收錄於《四部備要》（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第一百二十四冊，卷十四，頁94下。

〈歡樂園雜詠〉發表了一年後，邱菽園又擔任了《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商餘雜誌》的編輯，他以此園地繼續刊登檀社詩人們的作品。儘管邱菽園沒有為《南洋商報》創作竹枝詞，但他的檀社同仁卻創作了一些組詩，如瑞于的〈星洲竹枝詞〉。<sup>42</sup> 值得注意的是，《南洋商報》是刊登竹枝詞最活躍的報刊之一。二戰後，該報幾乎是唯一還可見到竹枝詞的印刷媒介。其中最重要的是 1946 年該報記者謝松山（1891-1965）以筆名「浩劫餘生」發表的五十首〈昭南竹枝詞〉。它沉痛地紀述了日佔時期新加坡人的創傷經歷。<sup>43</sup>

1929 年，邱菽園成為剛剛創辦的《星洲日報》文藝副刊《繁星》的主編。後來他又創設了另一個文藝副刊《遊藝場》來發表幾乎都是他自己的詩作。<sup>44</sup> 1932 至 1933 年，邱菽園正是在該專欄發表了共一百二十九首之多的竹枝詞。與他早期委婉批評新加坡人奢侈生活的三組竹枝詞作品不同的是，這百餘首詩史無前例地涵蓋了多樣的主題，幾乎囊括了當地早期作家曾描寫過的所有方面，在新加坡無人可與比肩。它們也是竹枝詞創作中靈活運用組詩形式和注釋文字的上佳例證。確如李慶年所指出的，邱菽園晚年對詩學的看法明顯發生了變化。他過去更為推崇嚴謹的、文人化的詩風，但在《遊藝場》中，他降身為更加大眾化的竹枝詞與打油詩的作者，這或是由於他與底層生活有了更為密切的接觸，並感受到國族的危機。<sup>45</sup>

李慶年選錄這一百多首竹枝詞時，將邱菽園發表在《星洲日報》的〈星洲竹枝詞〉分成了兩組。第一組二十首，以「猿公」為筆名分別刊載於 1932 年 7 月至 8 月的四期報紙上。<sup>46</sup> 筆者查找報紙原件時，發現其中兩首其實題為〈榴槿竹枝詞〉，且還有另外三首，並未被李慶年收錄。<sup>47</sup> 因此，筆者將直接引用報紙的原件，除非報紙本身已損壞得太嚴重。邱菽園在最開頭的兩期中提到這些詩是用粵語撰寫的。<sup>48</sup> 如第一組的一首寫道：

自由口岸聽船埋，油水從新有得揩。高竇莫攀低弗就，終然光棍無皮柴。<sup>49</sup>

這首詩奚落了當時一些新移民，他們或許曾受過教育，卻不能放下自己的尊嚴適應新的生存環境。這裏的「埋」（泊岸）和「高竇」（高傲）都是廣東話。儘管這些以「猿公」為筆名發表的系列竹枝詞沒有一個明顯的主線，但第一組詩似乎比較關注三十年代的經濟蕭條，第二組則主要針對廣東人，如愛好蛇羹者、私會黨、女勞工和生活荒誕的粵劇女伶。<sup>50</sup> 第三組涉及更多元的主題，其中之一是吸食鴉片：

戒煙設社備橫床，魚貫煙人列幾行。戒得心來萬事穩，更無絕妙戒煙方。<sup>51</sup>

這首充滿說教意味的詩歌或許有些枯燥，但它也揭露了一個事實——戒煙的最佳「處方」就是澆熄心中的慾望。邱菽園年輕時，也是一個「癮君子」，因此他迫切告誡他人不要步他的後塵。除了這首詩，在他的兩條筆記中也提出了相似的勸誡。<sup>52</sup>

<sup>42</sup> 釋瑞于：〈星洲竹枝詞〉，《南洋商報》，1925 年 5 月 8、9 日；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106-107。

<sup>43</sup> 謝松山：〈昭南竹枝詞〉，載於《南洋商報》，1946 年 6 月 6 日-28 日。謝松山後來將這組詩擴充為一百首，重新發表在 1947 年的兩期《南洋雜誌》（2.3 和 2.4），題名〈昭南紀事詩〉。1950 年，整套詩由《南洋商報》重刊成書，並取了更加血腥的書名《血海》。關於謝松山《血海》的進一步研究，詳參拙作：〈亦詩亦史：描述新加坡日佔時期的舊體詩集《血海》〉，載於《清華學報》，2017 年第 47 卷第 3 期，頁 547-589。

<sup>44</sup>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459。

<sup>45</sup> 同前註，頁 462。

<sup>46</sup> 《星洲日報》，1932 年 7 月 17 日、24 日，8 月 7 日、14 日；或參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177-178。

<sup>47</sup> 見《星洲日報》，1932 年 7 月 24 日，第 15 版。

<sup>48</sup> 儘管邱菽園出生於福建，但他八歲以前在澳門生活過幾年，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因此他說，每當在新加坡遇到廣東人，都像是遇到自己的同鄉。詳參邱菽園：《揮塵拾遺》，卷一，頁 11 後。

<sup>49</sup> 猿公：〈星洲竹枝詞〉六首之其六，刊載於《星洲日報》，1932 年 7 月 17 日，第 15 版。

<sup>50</sup> 猿公：〈星洲竹枝詞〉六首，刊載於《星洲日報》，1932 年 7 月 8 日，第 15 版。

<sup>51</sup> 六首之其六，刊載於《星洲日報》，1932 年 8 月 14 日，第 15 版。

<sup>52</sup>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卷一，頁 12 後；卷二，頁 17 後-18 前。

五首〈榴槿竹枝詞〉（其實第一首是關於菠蘿蜜的）正如詩題所說，寫的是當地人熱衷吃榴槿的情況。但邱菽園顯然對榴槿沒有什麼好感，還不忘提醒讀者過度食用榴槿的害處，例如榴槿不能與酒精同食：

學人飲下勃蘭池，飽飫榴蓮慰渴饑。補字為牠迷信誤，個條老命實而希。<sup>53</sup>

他為讀者提供了詳細的腳注來說明榴槿與酒精同食的危害。首先，他解釋「而希」是廣東方言，意即「危險」。接著指出：「凡榴槿合高度酒精入胃，常會激增高體溫，癥成不治，徇是死者，歲必有聞。蓋僑胞迷信此果為能補，是一大誤。」根據現代醫學知識，食用榴槿的副作用之一是致使血糖升高，因此糖尿病患者應避免過量進食，但並沒有證據顯示，榴槿與酒精同食會導致嚴重的疾病。儘管邱菽園對榴槿有些誤解，但這首詩仍流露出他對同胞健康的關注。

這些竹枝詞以一種諷刺、詼諧的語調寫成，注釋中提出的警示卻帶有嚴肅的口吻。這是許多竹枝詞的普遍特點。由邱菽園的例子可以清晰地看到，詩與注釋有著不同的文學功能：詩句專注於情感的表達，注釋則提供了背景信息和作者更詳細的觀點，兩者結合就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將抒情與敘事同時傳達給讀者。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讀者首先會從美學的角度欣賞一首詩，接著通過注釋對作者意圖有了一個更完整的理解，最後再回到詩歌本身，更完整地領悟整首詩的思想感情。在整個過程中，讀者的參與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事實上，近代許多竹枝詞都充滿了異國的元素，如果沒有注釋的幫助，讀者是難以理解的。

之前邱菽園的〈歡樂園雜詠〉僅有簡短的注釋，儘管有關「十六夜」的兩組竹枝詞都有詩序。直到這組有關廣東人的〈星洲竹枝詞〉，他才附加了詳細的注釋。此後，他的每一首竹枝詞都會附加或長或短的注釋，這一轉變足以說明他希望作品更容易被普羅讀者接受、或被當做歷史文獻流傳下來。

這些作品也充份展示了邱菽園對組詩形式的靈活運用。雖然他大多數的竹枝詞並沒有一個中心主題，但〈榴槿竹枝詞〉、「十六夜」竹枝詞及〈歡樂園雜詠〉等，儘管沒有一定的次序，大部分作品仍是互相關聯的。如〈榴槿竹枝詞〉，除了第一首，每一首都談到榴槿的某一個方面，比如氣味、本地人的嗜食、過食的問題以及關於它的起源等不同說法。如果把它們分開來，每一首作品仍然能夠獨立存在，但只呈現了事物的某一方面，整組作品結合在一起才呈現出一個更完整的圖景。

邱菽園在《星洲日報》發表的另一套〈星洲竹枝詞〉為注釋和組詩的寫作方式提供了更好的例證。這一系列共有一百零六首，李慶年將它們全部列在一起，置於「邱菽園」名下，與之前作者筆名「猿公」的那一系列分離開來，但這種做法卻有一定的誤導性。<sup>54</sup> 由報紙原件可知，邱氏實際上是以不同的「號」或筆名發表了這百餘首作品，如「嘯虹」、「肅虹」、「肅工」、「宿員」、「菽園」、「俶」、「俶公」、「宿」、「繡原」、「叔元」。這些名字有著相似的發音，因此都可以看出是邱菽園本人，而「嘯虹」是他的另一個號。這些作品分別發表在 29 期《星洲日報》上（從 1932 年 9 月 4 日至 1933 年 10 月 29 日）。

組詩的功能在這個系列的〈星洲竹枝詞〉中得到充分發揮，1932 年 5 月 14 日發表的四首與本地飲食有關的作品尤為突出。這組詩有一篇意味深長的序言，不僅介紹了詩作的內容，也可以視作邱氏對自己整個竹枝詞創作的總結概要：

<sup>53</sup> 《星洲日報》，1932 年 7 月 24 日，第 15 版。

<sup>54</sup> 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 179-191。



本島社會複雜，風尚情偽，亦各殊焉。年年以竹枝寫之，千態萬彙，既竭吾墨而未窮其形，亦如一部廿四史從何處說起矣。頃就其表面顯著之吃字落墨，以僑胞及余為模特，得詩四章，倘遇民史採風者，其亦有取乎爾。<sup>55</sup>

邱菽園坦言竹枝詞的創作並不能涵蓋當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儘管強調記錄當地風俗的社會與歷史價值是這種文體本身的創作傳統。序言最後仍然表達了作者這方面的願望，希望史家能採用它們，並當作社會民俗的記載。四首詩都有副標題寫明它們描述的食物，包括榴槤、番薯、咖喱和「牛油」（黃油）。由注釋文字可知，這組詩也有一個中心主題，就是食用這些東西是否是「摩登」的行為。例如第一首榴槤，他再次重申他覺得榴槤沒什麼好吃的，人們嗜食只是追趕潮流，相比之下，番薯顯得太過落伍，因此土著居民嘲笑新移民為「吃番薯」（意為「愚蠢」）。第三首則寫道，咖喱是辛辣香料與椰漿調和而成的，是華人和洋人都喜歡的「摩登」食品。至於第四首「牛油」，作者解釋說正確的名字應為「牛奶油」，因為它是牛奶做的，而不是牛的脂肪。他還指出，「牛油」這個詞的縮寫就像「摩登」一辭那樣帶有誤導性，「摩登」的最初的原意應指「時代改善」。這些注釋也展現出邱菽園的學者風範及他對流行時尚的批評態度。

第二個系列的第一組竹枝詞再次顯示出邱菽園對南洋文化的熟悉和注釋的作用，因為它們是用閩南話音譯馬來語寫成的。這一點充分體現了作者的創造性，也使詩句充滿了異域風情，顯見邱菽園對當地語言的駕馭能力及對南洋生活的融入。然而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如果沒有注釋來解釋這些馬來語，恐怕整組詩都難以辨認。如：

馬干馬莫聚餐豪，馬里馬寅任樂陶。幸勿酒狂誼馬己，何妨三馬喫同槽。<sup>56</sup>

如果僅按照中文字面意思，讀者或許會認為這首詩寫了幾個姓馬的人（馬干、馬莫、馬里、馬寅和馬己）酒醉之後起了爭執，但仍然不明白最後一句為什麼只剩下「三馬」來分享食物。多虧了邱菽園自己的註解，及李慶年將馬來語原詞拼寫出來的補充，我們才知道這些詞語原來是馬來語。「馬干」（Makan）是「吃」的意思，「馬莫」（Mabok）是「喝酒」，「馬里」（Mali）是「來了」，「馬寅」（Main）是「玩耍」，「馬己」（Maki）是「言語衝突」，「三馬」（Sama）代表「一起」。因此這首詩的意思是大家一起聚餐，樂也融融，但不要酒後亂性，引起無謂的爭端。

詼諧的語調中流露出對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期盼。就像之前的作品一樣，即使是在這樣風趣的詩中，邱菽園也不忘扮演一個道德教化者。此外，「三馬同槽」其實也是一個歷史典故，指的是司馬懿（179-251）和他的兩個兒子司馬師和司馬昭，他們謀奪了「曹魏」（「曹」與「槽」諧音）政權。由此可見，邱氏時時能夠將他的學養巧妙地融匯於詩中，其書卷氣的確令人讚歎。

但邱菽園並不是第一個在舊體詩中使用馬來語詞彙的詩人。他的靈感可能來自於他的朋友，主張「詩界革命」的梁啟超等人，他們也熱衷於在詩中使用外語和新詞。<sup>57</sup> 早前也曾有人在竹

<sup>55</sup> 《星洲日報》，1933年5月14日，第15版。

<sup>56</sup> 六首之其四，載於《星洲日報》，1932年9月4日，第15版。

<sup>57</sup> 1896至1898年前後，晚清學者梁啟超（1873-1929）和他的革新派同仁一同發起了「詩界革命」，在舊體詩創作中使用新詞彙和典故來回應時代的變遷和西方文明的湧入。新加坡詩人對新詞的運用或許是受到了此次文學革命的影響，但從竹枝詞文體自身的靈活性來說，這種創作手法也很普遍。事實上，在「詩界革命」之前，早在1681年，尤侗（1618-1704）的《外國竹枝詞》已經有了這種傾向。見尤侗：《外國竹枝詞》，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關於「詩界革命」的研究，見Schmidt, Jerry D., *Within the Human Realm: The Poetry of Huang Zunxian 1848-19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7-77.

枝詞中使用馬來語。最顯著的應屬賴逋泓的四首〈晚秋旅感〉，最後一首云（斜體字是馬來語詞彙）：

天涯浪跡感 翰沙（Susha，困苦），捨影（Sayang，可惜）韶光兩鬢華。

古打（Kuda，馬匹）脛疲人已老，吟鞭何日布鈴（Pulang，回返）家。<sup>58</sup>

與邱菽園不同的是，賴逋泓沒有為這首詩做任何注釋。如果沒有李慶年對這些馬來語的解釋，它們將很難破譯。賴氏對當地語言的運用說明了他對當地生活的熟悉，但詩意卻表明，他與那些同時代的移民一樣，仍然視中國為祖國，並渴望有朝一日能夠回返祖國。

不同語言和方言的交織，包括馬來語、英語、印地語、泰米爾語、漢語、福建話、廣東話、潮汕話，使新加坡成為一個有趣而複雜的社會。身在其中，很容易被這樣的多語言環境影響，有時興奮，有時困惑，有時甚至產生誤解與摩擦。邱菽園敏銳地察覺到有時語言的使用不當及翻譯、音譯所引起的問題。在他的竹枝詞中，他還曾批判一些新移民學習馬來語粗話的行為。<sup>59</sup> 他意識到英文里的「doctor」、「coolie」、「chief」和「comprador」在音譯成不同方言時，會產生有趣的效果（例如，「doctor」在閩南話中聽起來像「駱駝」）。<sup>60</sup> 他還指出，福建話中對「老闆娘」的尊稱「頭家娘」，在廣東話里是貶義的（「事頭婆」是鴇母的意思）。<sup>61</sup> 總而言之，他認為，一個人是很難理解這麼多種不同的語言並作出恰當的翻譯。<sup>62</sup>

在新加坡，不同種族的融合不僅體現在聽覺上，也體現在視覺上。在馬來語組詩出版一個月之後刊登的一首詩里，邱菽園描寫了新加坡街頭不同膚色的人們：

黃紅棕白黑相因，展覽都歸此島陳。十字街頭聊縱目，五洲人種各呈身。<sup>63</sup>

邱菽園在這首詩的注釋中寫道：「星洲雖彈丸小島，僑氓群萃，為他處所罕觀，夙有人種博覽會之稱，非屬誇誕。」比語言和膚色的差異更複雜的是文化差異。其中之一就是根據不同種族的傳統在不同的日期慶祝新年的差異，正如邱菽園在另一組竹枝詞中寫道：

各族新年各個新，兜溫麻汝不須春。占星候月球公轉，都是團團大地人。<sup>64</sup>

第二句中的「兜溫麻汝」（Tahun Bahru）是「新年」的馬來語說法。詩的最後一句，邱菽園闡明，無論各個種族的社會風俗多麼不同，但人人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作者站在了時代的前沿，採用了類似全球化的視角，希望能消除新加坡各個種族之間的文化隔閡。

移民的湧入、擁擠的生活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如公共秩序與健康的惡化、教育資源和工作崗位的不足，與此同時，新加坡經濟正遭受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嚴重打擊。<sup>65</sup> 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和文學傳統影響的詩人，邱菽園不僅批判一些有違道德倫理的行為，也為百

<sup>58</sup> 《南洋商報》，1926年12月3日，第22版；或參李慶年：《南洋竹枝詞匯編》，頁133。

<sup>59</sup> 六首之其二，載於《星洲日報》，1932年10月16日，第15版。

<sup>60</sup> 五首之其四、其五，載於《星洲日報》，1932年10月23日，第15版。

<sup>61</sup> 四首之其二，載於《星洲日報》，1932年11月13日，第15版。

<sup>62</sup> 他在詩中寫道：「錦蠻重譯聽來難」，見《星洲日報》，1933年5月28日，第15版，四首之其一。

<sup>63</sup> 八首之其一，載於《星洲日報》，1932年10月2日，第15版。

<sup>64</sup> 四首之其一，載於《星洲日報》，1933年5月7日，第15版。

<sup>65</sup> 關於公共秩序與健康，見《星洲日報》，1933年2月19日，第15版（四首之其一、二）；關於教育，見該組四首之其三、以及1933年8月20日，第15版，第二首；關於經濟蕭條，見1932年10月16日，第15版（第三首）及1933年3月26日，第15版（第二首）；邱菽園還曾寫過一首關於幫派鬥毆的詩，見《星洲日報》，1932年11月13日，第15版（第一首）。

姓的苦難感到悲傷。<sup>66</sup> 有時，他在詩中表達了他及大多數華人移民對祖國的關心，並希望抗日戰爭能夠取得勝利。例如：

杏花春雨倚樓頭，恢復神州盼陸游。一早開門聽喜鵲，沿街日報喚星洲。<sup>67</sup>

邱菽園在此為《星洲日報》賣了廣告，反映它是僑胞了解國情的重要渠道。但整體說來，邱氏對祖國和南洋同樣眷戀，帶有高嘉謙所謂的「雙鄉意識」——用以形容華人移民以南洋和中國兩處皆為「鄉」的意識。<sup>68</sup> 他一生中大多數的時間都在新加坡度過，並在這裏終老，顯然並沒有打算真的回到中國去，正如他在一首竹枝詞中寫道：

點綴南荒破大荒，居然本地好風光。平添八景湖山壯，久把星洲作故鄉。<sup>69</sup>

邱菽園在注釋中回憶起三十年前（1902 年），曾以「星洲八景」徵人題詠。<sup>70</sup> 而此時他想像或可再添八景，續增詩作。他在詩中認為此地雖然偏遠且不夠發達，但他願意和文友共同努力，一起發掘本地的美景，使它成為更怡人的居所。正是由於早期移民的這種開拓精神，新加坡才會有今天的成就。

#### 四、結語

綜上所述，邱菽園的竹枝詞從廣泛的主題中呈現了殖民地時期一幅複雜的南洋社會圖景。它們帶有濃厚的南洋色彩，生動地描繪了當地的民風、社會情況，以及表達了作者的家國情懷、本地意識。同時，邱菽園也希望藉竹枝詞的創作，改變一些不文明的社會習俗，並透過詳細的注釋，把作品當作歷史文獻一樣流傳。竹枝詞的一些文體特徵，也在其作品中得到充份的發揮，如地方語言、注釋和組詩形式的運用，以及幽默、詼諧的。簡而言之，以竹枝詞來記錄南洋風土與異域風情時，邱菽園在處理新內容和使用新語彙上，充分發揮了這一文體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樣的創作實踐可以同時視為作者對傳統文化（文體形式和創作傳統）的繼承及對異域生活的適應與接受。此外，他的竹枝詞雖然表面看來符合大眾品味，卻也展現了他自身的學術修養和精英階層的見識。

邱菽園與其他新加坡詩人的竹枝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地社會的歷史和時事。然而，無論主題多麼豐富與多元，竹枝詞並不能完全地代替一般的歷史和社會文獻。正如邱菽園在他的作品序言中坦言，竹枝詞不可能涵蓋當地社會的方方面面。當我們將該文體篇幅的短小及作者創作的隨意性納入考慮，便尤其如此。詩人們只能關注到當地生活的有限領域，正如傳統的竹枝詞作者一樣。然而，這樣的局限也並沒有削弱這些作品的社會和文學價值，它們可被看作土著與華人移民情感的真實記錄，同時也有助於構建一個獨特的南洋詩歌傳統。

從更廣的範圍看來，竹枝詞的創作在不同的海外華人地區及大陸周邊地區（如香港和臺灣）都是非常普遍的文學現象。雖然這些作品反映了不同地方的特色與風土，但它們在文學風格與

<sup>66</sup> 邱菽園曾在一首詩中批判一個老翁娶了一位年輕的姑娘，只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星洲日報》，1933 年 10 月 22 日，第 15 版）。他在另一首詩中表達了對烈日下辛勞工作的人力車夫的同情（《星洲日報》，1932 年 10 月 2 日，第 15 版，第二首）。

<sup>67</sup> 四首之其二，載於《星洲日報》，1933 年 1 月 29 日，第 15 版；他曾在一首詩中寫到中華民國的國旗，載於《星洲日報》，1933 年 6 月 18 日，第 15 版（四首之其三）。

<sup>68</sup> 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2010 年第 32 期，頁 384。

<sup>69</sup> 《星洲日報》，1933 年 2 月 26 日，第 15 版，兩首之其一。

<sup>70</sup> 當時的「八景」分別為：星洲初月、球場晚風、鐵橋殘照、馬坡宿雨、旗山晴雲、東陵夕霽、沙嘴晚煙、官亭夜濤。徵稿啟事刊於《天南新報》，1902 年 6 月 24 日第 6 版。應徵詩作由該年 9 月 25 日開始，陸續刊登了 15 期，至 12 月 26 日止。原來的「八景」，與邱菽園這首竹枝詞注腳中提到的略有出入。

創作方法上有諸多相似之處。若能進一步作地區性的對比，那麼對於華人離散經驗的跨域研究和現代舊體詩研究，都會有相當的價值和意義。

